

大城市地区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例

王鹏飞

(首都师范大学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 运用政治生态学 (political ecology) 的基本观点, 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对象, 在对平原、丘陵、山区 4 个不同类型村庄多年实地调查基础上, 分析了在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影响下北京郊区农村的组织形态、产业结构、土地利用、耕地质量、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研究揭示, 1979 以来北京农村政治改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其他的农村地区不同, 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使北京农村生态环境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恶化 - 改善的波动性过程; 根据长期研究, 政体改革、政策变化在总体上起到了抑制生态恶化、改善农村环境的作用。

关键词: 农村改革; 政治生态学; 国家政策; 资源利用模式; 北京市

文章编号: 1000-0585 (2005) 03-0453-11

1 引言

改革开放后, 我国农业与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 工业化与城市化以及政治的、经济的环境变化被认为是重要的原因。近年来大城市周边的农业与农村问题吸引了许多地理学者的关注, 成为农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尽管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 但是, 大多数研究是以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周边的农业与农村为对象, 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相对较少。为此, 本研究以北京市农村地区为研究对象, 运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在地理学界导入的政治生态学 (political ecology) 的观点, 就北京市农村的变化及要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进行分析。其中, 特别就国家政策的变化对农村土地利用的影响进行分析, 揭示此地区的资源利用方式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大城市地区的农业生产因为具有城市与农村的特性, 其地区呈现出复杂的模式。在国外基于杜能 (Thunne)、辛克莱尔 (Sinclar)、布赖昂特 (Bryant)、绿带 (green belt) 等理论模式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对而言, 我国地理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且以宏观分析为主 (小岛 1999)^[1]。至今, 对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从城市结构与机能、人口分布与流动、土地利用等方面进行了许多研究。其中, 近年以北京市为对象的研究可列举出鲁奇 (2001)、庄大方 (2002)、冯健 (2003) 等^[2~4]。但总体来看, 以大城市周边的农村为对象的研究还是比较少。作者曾就北京市近郊农村地区的变化以村为单位进行过论述 (Wang 1999, 2000)^[5,6], 但是感觉并未充分掌握其变化的模式。为

收稿日期: 2004-07-22; 修订日期: 2005-02-27

基金项目: 日本科学协会笹川科学振兴基金 (12 - 196) 的支持项目, 后期补充调查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科学基金 (222143) 的支持。感谢北京市各级政府与案例村庄的村民们在调查中给予的协助与支持。

作者简介: 王鹏飞 (1964-), 男, 北京市人, 副教授, 博士 (日本东京都立大学)。主要从事农业/农村地理学、农村可持续发展、农村旅游等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十几篇。

E-mail: pengfei2008@sina.com

此,笔者基于乡镇一级的统计资料,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典型农村地区的变化与差异,研究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全体变化模式。

2 政治生态学的理论与方法介绍

近年,对大城市周边地区进行地理学研究强调城市作用的同时,也把城市周边的自然环境(土地与气候条件)、社会经济环境(土地所有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土地利用政策等)、历史文化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发展历史等)作为决定城市周边的农村与农业的特征和地域变化的要因^[17~12]。但是研究中有关地理学最基本的观点“人与环境”关系的分析还有待加强。从政治生态学角度尽管开展了有关时空变化与社会适应性的讨论,但有关空间要素的分析还很少(Grossman 1993)^[13]。

政治生态学是效仿政治经济学于20世纪80年代新造的词汇,明确阐述政治生态学的观点出现在80年代初期(田島 1995)^[14]。Watts于1983年在分析了尼日利亚的小农社会面对有史以来的特大干旱而失去应对能力的过程后指出:“小农社会失去应对旱灾的能力是资本主义渗透的结果”^[15]。此后,Bassett(1988)、Bennett(1984)、Blaikie(1985)相继用同样的观点分析了在发展中国家因围绕着资源利用而引发的居民对立,其结果招致的环境破坏^[16~18],即国家的开发政策,使作为小农和牧民生活基础的土地受到影响,使传统以土地谋生的经营模式与生活模式发生了变化,其中环境变化最深刻的影响是土壤侵蚀。其原因是传统的土地利用形态发生了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带来影响的是围绕生产者了政治经济的状况所产生的(Schroeder 1993)^[19]。Blaikie(1995)指出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内容就是分析小农与牧民面对不断扩大的资本主义影响,而使他们的环境利用产生变化的结果^[20]。政治生态学及其派生出来的共同观点是,农村社会、农村家庭、农民个人针对外界的变化(自然的、人为的),各自内部积蓄的各种制度、技术、权力结构等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21~25],其结果在社会内部、家庭内部,进而在世代之间、性别之间、民族之间产生了对立与紧张,对作为农村社会生活基础的土地利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26]。

Bassett(1988)^[16]列举了政治生态学的五个重要的研究观点,它们是:1)分析在各个地域等级中的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演变;2)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注重资源利用的传统体系变化的历史过程的传承;3)分析国家的干涉对农民的土地利用模式的影响;4)在生产与交换的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地方一级的决策制定主体针对这种变化的对应;5)在进行分析研究中,注意地方主流形态对社会发展的不同反应,强调注重地区的特殊性。

针对一些政治、经济学科忽视深入实地的倾向,政治生态学强调重视地方一级的社会经济状况和生态问题的实地调查。近10年来政治生态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大多数研究是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第三世界国家为研究对象,但是,Muldaivn(1997)^[27]则是运用政治生态学的观点,以黑龙江省肇州与巴彦两县为例,论述了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的环境分化。Muldaivn指出农民们在不安定的环境中(土地使用期限不明),因注重短期利益,过度耕种、过度放牧、不维修农田基础设施,产生了农田的荒废,

例如:据统计1995年以后,北美诸大学提出的有关政治生态学的博士论文每年都在10篇以上。还有,对在1995~1998年间论文摘要的关键词中有政治生态学的论文进行分类得出,地理学为16篇、文化人类学5篇、社会学4篇、政治学3篇、环境学3篇、教育学2篇。

造成环境退化。Muldaivn 的研究是以纯农村地区为对象，集中论述了随着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带来了农村生产环境的退化，而大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是如何变化着呢？由于此地区的农民从农业以外获取现金收入的机会较多，并不把增加收入的希望寄托在农业生产上，所以区位条件的不同，变化的结果也是不同的。这可以被认为是大城市周边农村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

为此，笔者认为在分析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各种变化时，借鉴政治生态学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分析把握资源环境利用的新变化。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注重生产组织、粮食生产战略、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等对自然环境的影响 (Blaikie et al. 1994)^[28]，在政府与农民之间能提供一种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新的资源利用模式。

3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变化模式

3.1 北京农村地区研究的基础资料和研究框架

北京市的农业生产是在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政治条件不断地相适应而发展变化的，呈现出地区的多样性。在北京市农村变化的过程中具体地说明改革开放后构成农村社会和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和支撑其各种条件的变化对农村地区的环境（自然的、社会的）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在与政策和农业经营方式变化相互联系时，其结果反映在地表的景观上，促使农村景观发生变化。所以，土地利用与农村的生产活动（农业的、工业的）以及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反也意味着构成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与支撑它的各种条件的变化。于是，分析这些变化能成为解释农村变化与地区特征的有效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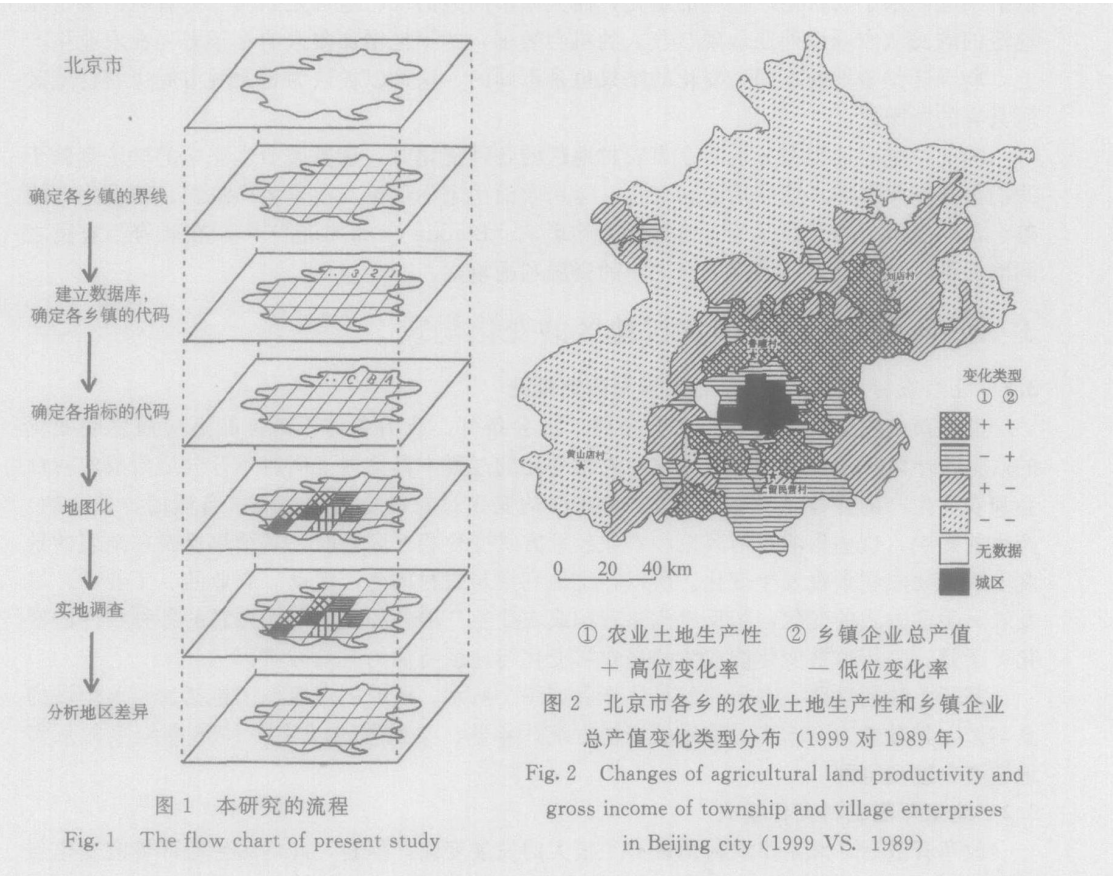
基于上述的思路，本研究的具体步骤如图 1 所示，研究的对象地区包括北京市全域的乡与镇，其数量为 266 个。使用的资料由统计年鉴、文献资料以及从 1996 年至今的从实地调查中整理得到。

3.2 北京郊区农村变化模式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农村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但是，此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与地区自然环境和生产活动有着紧密的联系，突出的问题是农业用水的不足与浪费、土地资源的减少与土壤理化性质的低下、来自城区废弃物与农业生产自身与乡镇企业对农村污染的加重、农业用地的利用与保护的矛盾加大等等。如何解决好这些随着改革而来问题，关系到农村是否能进行可持续发展。农民们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不同的行为致使农村地区的变化呈现出了多样性^[29]。

在分析北京市农村地区变化的多样性时，本文以农业土地生产性与乡镇企业总产值为指标，探讨此地区的变化模式。农业土地生产性就是单位面积的收益，即农业粗收益除以耕地面积。首先，计算 1989 年与 1999 年各乡镇的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与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由于各区县全面开始对乡镇企业进行统计是在 1986 年后，为了与农业土地生产性相对应，在此，计算 1989 年与 1999 年各乡镇的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其次，分别求出变化率的平均值与标准偏差，以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和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偏差为基准，分别分为低位与高位。将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的高位和低位与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的高位和低位进行组合，可以得出北京农村地区变化的四种类型，即： 型：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与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都低的乡； 型：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低、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高的高位； 型：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高、农业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低的高位； 型：乡镇企业总产值的变化率与农业

土地生产性的变化率都高的乡。这些变化率的分布模式如图 2 所示。



为了更加详细地把握各类型农村地区的农业经营现状以及农村地区与地区生态系统的变化, 作者分别选取属于 型地区的鲁疃村、 型地区的留民营村、 型地区的刘店村和 型地区的黄山店村进行实地调查。

鲁疃村位于北京昌平区的东南部。1999 年有农业用地 296.7ha, 其中, 286.7ha 是耕地, 约占农业用地的 97%, 其余为果树。粮食产量近 300 万 kg, 有各类农机 20 台。村有乡镇企业 5 家, 年产值近亿元。

留民营村位于北京大兴区的东南。1999 年的农地面积约为 110ha, 60ha 为耕地, 26.7ha 为菜地。有各类乡镇企业数十家, 年产值超过亿元。

刘店村位于平谷区的西北, 村子的地势是西高东低, 土壤由石灰性褐土与淋溶褐土构成, 不太适合农作物的生长。1999 年, 农地面积 104.7ha, 桃树约占 58%。鲜桃产量超过 1800 吨。

黄山店村位于房山区的中部。地形属于构造剥蚀低山, 土壤的营养成分少, 不宜农作物的生长。无霜期比平原地区短, 约为 160 日, 灌溉设施少, 只能依靠雨水来进行农作物的生产。1999 年的耕地面积约为 46.7ha。

4 不同类型的案例村庄的变化分析

四个案例村庄的基本状况与变化如表 1 所示。通过对这四个案例村庄的调查，进一步分析各个村庄是如何与国家政策的变化相对应而发展的。

表 1 1979 与 1999 案例村庄的基本条件比较

Tab 1 Comparison of basic conditions of case villages (1999 VS 1979)																			
地区 类型	事例 村庄	自然环境	区位	组织形态		经济活动		土地利用形态		耕地面积 (ha)		人均年收入(元)							
				1979	1999	1979	1999	1979	1999	1979	1999	1979	1999						
型	鲁疃村	平原地区	25km	集体	集体	农业	农业与工业 (第一服装厂、 第二服装厂、印 刷厂、纸箱厂)	小麦	小麦	360.0	296.7	70	3480						
		海拔 50 米												玉米	其中	其中	(120)	(6430)	
		潮褐土																	
		地下水丰富																	
型	留民营村	平原地区	33km	集体	集体	农业	农业与工业 (各种养殖厂、 农副产品加工 厂、无缝钢管 厂、汽车散热器 厂、旅游用品厂 等)	水稻	小麦	130.5	105.0	120	4000						
		海拔 10 米												玉米	其中	其中	(210)	(7800)	
		潮沙土、二合																	
		土和含盐二 合土																	
型	刘店村	丘陵地区	75km	集体	个人	农业	农业	小麦	桃树	127.8	104.7	82	2200						
		海拔 75-225 米												杂谷	(间作)	其中	其中	(-)	(-)
		石灰性褐土与 淋溶褐土																	
型	黄山店村	山区	65km	集体	个人	农业	农业	玉米	玉米	67	46.7	75	1100						
		海拔 200-1050 米												高粱	苹果树	其中	其中	(-)	(-)
		普通褐土与淋 渗褐土																	

注：1) 区位是指离北京市中心的距离。2) 耕地面积栏中的小麦与玉米为复种面积。3) 人均年收入，括弧里的数字是指劳动力的人均年收入。表中部分资料来源于作者实地调查。

首先从土地利用的形态来看，不管是离市中心距离的远与近，四个村庄全部都在进行农业生产，土地利用尽管还保持着农业景观，但从 1979 年到 1999 年，各村主要的农作物生产有了明显变化。

位于平原地区、属于 型地区的鲁疃村，在 1979 年，除了像小麦、玉米那样的粮食作物外，也种植蔬菜与果树。这些蔬菜与果品起到了向城区供应农副产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村民重要的现金收入源。到 1999 年没有了蔬菜生产，但果园的面积略有扩大。尽管离城区很近，但是与欧美等国不同，园艺农业并不发达，而以小麦和玉米为中心的粮食作物生产比较发达，这是因为鲁疃村被指定为粮食生产基地，粮食生产任务被上级部门所强化。可是，由于鲁疃村的乡镇企业也很发达，村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现金收入比农业生产高得多，所以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并不高。但是在政府强大的行政压力与村子雄厚的财政支持下，购买了许多大型农业机械，通过雇用外来务农人员维持着农业生产，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任务，形成了特有的近郊农业地区。

另一方面，同样是位于平原、但属于 型地区的留民营村，由于地势低，再加上排水

不好与土壤的盐碱性大等影响了作物生长。人民公社时期,由于农业生产是以水稻为主,修建了各种水渠,水稻的产量也年年增长。尽管留民营村有丰富的地下水源,但是受全市水资源不足的影响,水稻栽培面积也受到影响,为了维持地区的粮食总产量,由一年一季的水稻生产,改为一年两季的小麦与玉米的栽种,起到了提高粮食总产量的作用。还有,因为留民营村的粮食生产指标并不高,能进行多样的农作物生产,实现了蔬菜生产的扩大。可是,只进行农业生产并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必须发展农业以外的产业。村民们在专家的指导下,发展了对环境良好的农产品加工的乡镇企业,实现了循环型的农村社会。

属于丘陵地区的刘店村在人民公社时期,遵照国家政策,以小麦、玉米、杂谷的生产为主。由于自然条件不太适合粮食作物的生长,长期以来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到了1999年,刘店村农地的大部分变成了桃园。这是因为刘店村的乡镇企业不是很发达,为了增加收入选择了收益高的农作物,进行了本地传统的桃树栽培。还有,刘店村所在地的平谷区政府对农业生产的各种政策比较灵活,也使得刘店村的桃树生产得以发展。

位于山区的黄山店村的农业生产易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主要种植玉米、小麦和杂谷。由于大部分的耕地不能进行人工灌溉,产量受雨水左右。到了1999年,农业生产与1979年一样仍然是以玉米、小麦和杂谷为主,只是春小麦改为了冬小麦,还能看到一些苹果园。通过改革开放,黄山店村从以前的吃返销粮村变为了自给自足的村庄。由于人多地少,村民出去务工的人数增加,依靠这些现金收入改善了家庭条件。实施自给自足农业生产的结果防止了耕地的过度耕作,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起到了保护土壤的功效。

其次,以农村组织形态看,1979年,4个案例村庄全都实施集体经济。这是由当时的政治社会经济条件所致。改革开放与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实施以及撤社复乡,案例村庄的农业生产组织也分为集体经营与个人经营二种。位于平原地区的鲁疃村与留民营村为了维持农业生产而保留了集体经营,但这种集体经营的性质与以前有很大不同,并不是单纯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而是村领导班子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认为有必要进行统一管理,在征求村民的同意后继续维持集体农业生产。位于丘陵与山区的刘店村与黄山店村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业生产落后,随着人民公社的撤消而实施了家庭生产责任制。这两个村庄离城区较远,没有受惠于北京市乡镇企业的发展,村民们为了增收加大了对收益性高的农作物的生产,或者外出打工,村民们认为比起集体经营,个人进行农业生产的好处要大得多,所以实施了家庭生产责任制。

第三,从村子集体经济来看,位于平原地区的鲁疃村与留民营村,不光是农业生产发达,农村工业也很发达。农业生产的发达首先受惠于自然条件。其次,有关农业生产的新技术引进与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也为北京市平原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受离城区较近的区位条件、城区相关企业从城区的迁出以及当地政府的各种政策的影响而有很大发展。可是,离城区较远的位于丘陵地区的刘店村与位于山区的黄山店村因为未受惠于乡镇企业的发展,村子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村社会经济差异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地区差异。

从表1可以看出,四个案例村落的经济活动、土地利用、农民收入的差异与其组织形态有关系。从事集体经济的鲁疃村与留民营村的农村工业生动活泼,村民的收入也达到了

较高水准。实施家庭生产责任制的刘店村与黄山店村是进行个人经营的，这两个村庄由于乡镇企业不发达，村民的收入与鲁疃村和留民营村相比有几倍的差。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首先，与北京市总体的乡镇企业的发展有关，其次，地方领导干部起到了很大作用。总之，从四个案例村庄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对各个村庄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政策和村干部与村民对政策的执行力度。

5 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分析

从北京市农村地域变化的类型可以看出，因国家政策的变化北京市周边的农村地区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如前所述，政治生态学的基本观点是解释政治与经济的变化对地域资源利用模式的影响。通过案例调查，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可以如图 3 所示。改革开放后，从案例地区的变化可以确认出有关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是经历了三个阶段而变化的。这三个阶段是由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3 年）、过渡期（1984～1989 年）、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期（1990 年以后）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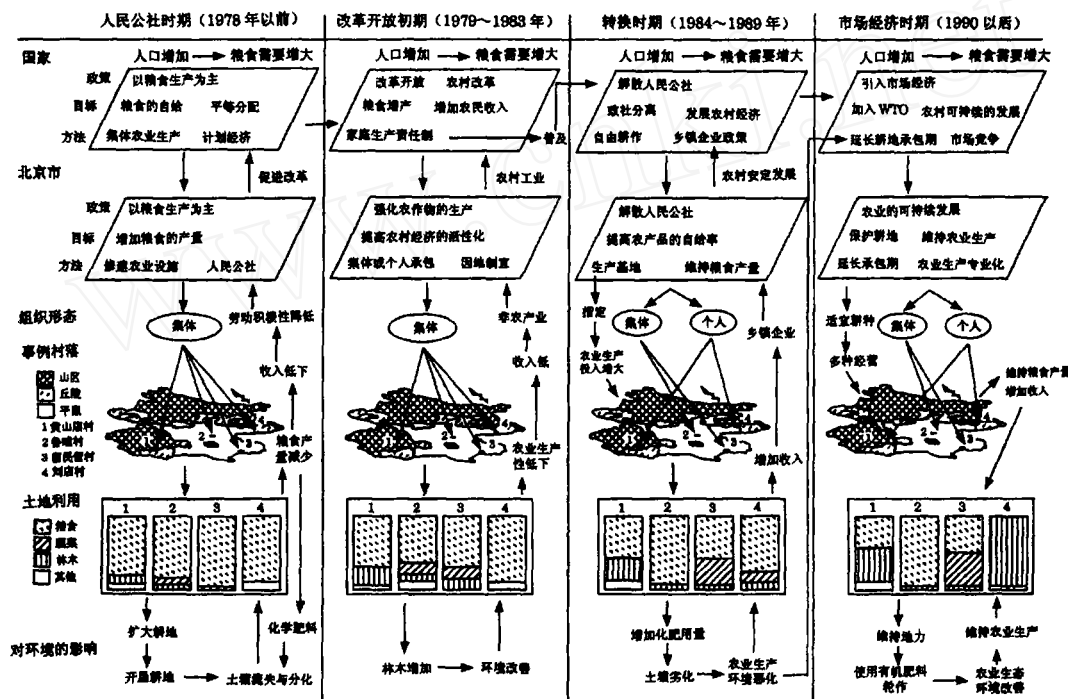


图 3 北京市农村改革的政治生态学变化

Fig. 3 Political ecology of rural reform in Beijing city

1949 年以后，我国依靠集体的力量修建了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可是，从 50 年代后期开始，因政策的失误与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并不能说是一帆风顺。在传统的农业地区，为了消除因人口增长而带来的粮食不足，普遍实行了复种，在个别地区复种率达到了 180 %。由于过度耕种，使耕地的地力年年低下，有机质的含量平均只有 1 %。农地不断开垦的结果，使森林与草地面积明显减少，导致了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平均主义，阻碍了农民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农业土地生产率与劳

动生产率都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中央政府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力, 决定进行以增加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为主要目的的农村改革。

在北京地区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致使农副产品的供需矛盾突出,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北京市政府提出了扩大各种农副产品生产的方针。通过这些方针政策, 活跃了农村经济。改革开放初期, 市政府针对农村地区提出优先发展农业生产, 只要完成了粮食生产任务, 也允许进行其他的农作物生产。由于认真贯彻了因地制宜的政策, 一些不适宜粮食作物生长的耕地纷纷改种经济作物。结果, 林木覆盖率有了大幅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水土流失, 起到了改善环境的作用。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但因农业土地生产率低, 农民的收入依然停留在很低的水准。为了增加收入, 农民一是提高农作物的产量, 用议价出售完成国家粮食收购任务后多余的粮食, 二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来改善农村社会经济。本文举出的四个案例村庄采取了不同的方法, 发展了农村社会经济。

尽管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的农业生产有了迅猛发展, 但是因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 使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面临着深刻的危机, 特别可以列举出耕地面积的减少、耕地地力的低下、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的污染等。北京市的耕地从 1952 年的约 60.8 万 ha 降至 1996 年的 40.6 万 ha, 平均每年减少近 0.5 万 ha。土壤中的有机质的含量超过 1.5 % 的耕地平均不到 8 %, 70 % 以上耕地的有机质含量低于 1 %, 氮肥的含量平均在 0.08 % 以下, 全磷含量为 0.08 ~ 0.17 %, 速效磷的平均值为 18.89ppm。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 农民从乡镇企业能得到比农业生产高几倍的现金收入, 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逐年降低, 使北京地区的农副产品的产量增长变缓, 满足不了城市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维持一定比例的农副产品的自给率, 市政府指定了许多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 被指定为生产基地的地方必须完成农作物的生产任务, 之后可以自由进行其他的农作物生产。

案例村庄鲁疃村由于被指定为粮食生产基地而进行了耕地的区划整理, 用乡镇企业的收入, 购买了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 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同时, 为了完成粮食生产指标, 选用优良种子、加大化肥使用量。化肥使用量由以前 750kg/ha 增至 1275kg/ha。结果, 土壤颗粒化现象较为明显, 土壤有机质的含量由以前的 2.4 % 降到 1.3 %, 氮含量也由以前的 0.12 % 降至 0.08 %。其他的案例村庄由于没有被指定为生产基地, 可以自由地进行农业生产。留民营村在村干部的领导下进行生态农业建设, 村民的收入与村庄的生态环境都得到了改善, 其中, 化肥的使用量由 1982 年的 30 万 kg 降到 1999 年的 7.2 万 kg。化肥使用量的大幅度下降, 不仅节省了开支而且使土壤的理化性能变好。土壤的有机质由 1982 年的 1.2 % 上升到 1999 年的 2.1 %, 有些田块更达到了 2.5 %。案例村庄的黄山店村由于没有了农业生产任务, 将人民公社时期开垦的农地退耕还林, 防止了土壤流失。林木的增加也改善了村落的景观。

进入 90 年代,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带来的食物结构的变化, 进一步加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另一方面, 急速的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导致耕地的减少与荒废、农业生产的粗放、耕地的过度耕种, 农业生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为了克服这种危机, 中央决定引进市场经济的机制对农村地区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粮食生产方面, 实行省长负责制, 确保国内的粮食总产量。通过延长耕地的承包期, 提高农民的耕地保护意识以达到农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市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 通过保护耕地、延长承包期、农业生产用地责任制等维持粮食生产。案例村庄鲁疃村为了进行可持续农业, 放弃了粗放的农

业生产而进行精耕细作。为了维持地力，增加有机肥料的使用量，进行豆类与粮食作物的轮作。结果使耕地的地力与土壤理化性能逐渐得到改善，土壤有机质的含量超过了原有水平，达到了 2.55%，氮肥含量也升至 0.118%，全磷含量达到了 0.18%，速效磷的平均值接近 19.57ppm。案例村庄的刘店村通过延长承包期，促进了果树生产的扩大，果树生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地生产率，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也使村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

6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政治生态学的研究观点，分析了北京市各个地域类型的农民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通过对案例村庄的实地调查可以看出：1)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的农村改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 Muldavin 指出的黑龙江省农业环境退化的例子不同，呈现出了地区的特殊性。其特征表现为政策的变化与其说使地区生态环境退化，还不如说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改善。2) 从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的生态环境的变化过程能确认出因国家与地方政府的政策变化呈现出了某种波动性的发展过程，这种波动性的发展使北京市农村地区呈现出了多样性。3) 北京市周边农村地区的农民，在如何与政府政策的变化相适应的过程中使农村地区的资源利用模式发生了变化。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从政策变化派生出的其他要素也不能忽视。

在分析北京市农村地区的诸变化时，立足于政治生态学的观点，通过宏观与微观调查明示了运用政治生态学理论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从案例调查得出的结果能正确理解在北京市全域的政治经济变化的纹脉中北京市农村地区的变化。必须认识到北京市农业生产与农村地区变化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产生除自然条件外，因政策的作用不同存在着农作物生产的差异。也就是说，国家与北京市政府的农业生产政策（确保粮食产量、可持续农业生产、家庭生产责任制等）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农村工业化进展的差异对农业生产与农村地区的影响也不能忽视。政治生态学在要求研究人员对研究对象地域及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状况给予更加关注的同时，也要重视实地调查对象的地域生态环境的特殊性。

本研究还存在今后需要更加深入的地方。首先，对农村家庭或农民个人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的分析。对构成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进行分析，探寻农民的个人行为不仅对地理学，就是对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次，如何将政治生态学的理论运用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在实地调查中揭示两者的内在联系，通过长期的农村调查进行研究积累，进一步探讨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地域条件。

参考文献：

- [1] 小島泰雄. 中国における1990年代の農村と地理学. 神戸市外国大学外国学研究所研究年報, 1999, 36: 1~39.
- [2] 鲁奇, 战金艳, 任国柱. 北京近百年城市用地变化与相关社会人文因素简论. 地理研究, 2001, 20(6): 696~701.
- [3] 庄大方, 邓祥征, 战金艳, 等. 北京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分布特征. 地理研究, 2002, 21(6): 667~674.
- [4] 冯健, 周一星. 北京都市区的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1982-2000). 地理研究, 2003, 22(4): 465~483.
- [5] Wang P. Changes of rural area in the outer urban fringe of Beijing City, China: A case study of Zhangge Village. Geographical Reports of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999, 34: 97~112.
- [6] Wang 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hange in the inner urban fringe of Beijing City, China: A case study of Rutang Village.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2000, 73B: 46~61.
- [7] Munton R J C. Farming on the urban fringe. In: Jhonson J H (ed.). Suburban Growth, Geographical Processes at

- the Edge of the Western City.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1974. 201~223.
- [8] Bryant C R, Mclellan A G, Russwarm L H. The City's Countryside.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1~18.
- [9] Kikuchi T, Moran W.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characteristic in the Auckland metropolitan region, New Zealand: A case study of east Tamaki area, Manukau city.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1990, 63A: 741~765.
- [10] Bryant C R, Johnston T R R. Agriculture in the city's countryside. London: Belhven Press, 1992. 199~205.
- [11] Marsden T, Munton R, Ward 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A review. Economic Geography, 1996, 72: 361~373.
- [12] Kikuchi T, Zhan G M, Guo H C. Land use changes and their driving force in the Beijing metropolitan area, China. Geographical Report of 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1997, 32: 43~57.
- [13] Grossman L S.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banana exports and local food production in St. Vincent, eastern Caribbean. Ann. Assoc. Amer. Geogr., 1993, 83: 347~367.
- [14] 島田周平. 熱帯地方の環境問題を考えるための新視角——脆弱性論とポリティカル? エコロジー論——. 見: 田村俊和等編著. 湿润熱帯環境. 東京: 朝倉書店, 1995. 67~74.
- [15] Watts M. Silent Violence: Food, Famine, and Peasantry in Northern Niger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140~149.
- [16] Bassett T J.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peasant - herder conflicts in the Northern Ivory Coast. Ann. Assoc. Amer. Geogr., 1988, 78: 453~472.
- [17] Bennet J. Political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projects affecting pastoral peoples in east Africa. Land Tenure Center Research Paper, 1984, 80: 1~16.
- [18] Blaikie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l Eros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Longman Group Limited, 1985. 154~157.
- [19] Schroeder R A. Shady practice: Gender and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resource stabilization in Cambian garden/orchards. Economic Geography, 1993, 69: 349~365.
- [20] Blaikie P. Changing environments of changing views? A political ecology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Geography, 1995, 80: 203~215.
- [21] 島田周平. ナイジェリアの経済変化と食糧生産構造変化. 見: 細見真也, 島田周平, 池野旬. アフリカの食糧問題——ガーナ? ナイジェリア? タンザニアの事例. 東京: アジア研究所, 1996. 64~149.
- [22] Bryant R L. Political ecology: an emerging research agenda in third world studies. Political Geography, 1992, 11: 12~36.
- [23] Bryant R L, Bailey S. Third World Political Ec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188~196.
- [24] Peet R, Watts M.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3~9.
- [25] Peet R, Watts M. Liberation ecology: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nd environment in an age of market triumphalism. In: Peet R, Watts M (eds.). Liberation Ecologie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Social Movements. London: Routledge, 1996. 46~68.
- [26] 島田周平. 新しいアフリカ農村研究の可能性を求めて——ポリティカル? エコロジー論との交差から. 見: 池野旬編. アフリカ農村像の再検討. 東京: アジア研究所, 1999. 205~254.
- [27] Muldavin J S S. Environment degradation in Heilongjiang: Policy reform agrarian dynamics in China's new hybrid economy. Ann. Assoc. Amer. Geogr., 1997, 87: 579~613.
- [28] Blaikie P, Cannon T, Davis I. At Risk: Natural Hazards, People's Vulnerability, and Disasters. London: Routledge, 1994. 1~14.
- [29] Wang P. Changes of land us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urban fringe of Beijing City, China. In: Laurens L, Bryant C (eds.).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Systems: A Soci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Montpellier: Universite Paul Valery, 2003. 577~590.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rural reform in metropolitan area in China :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city

WANG Peng-fei

(Environment , Resources and Tourism School ,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37 , China)

Abstract : This paper aims to illustrate the chang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 use patterns and state policies in the rural area of Beijing city with viewpoint of political ecology in China's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Based on years of fieldwork from 1995 , the results of the survey lead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 agricultural crop production has changed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olicies has changed. Second , the agricultural land productivity of Beijing city was influenced either by natural conditions or the changes in governmental policies. Third , rural industries in rural areas of Beijing city are centralized in those parts of the plain close to the city proper. Fourth , based on changes of agricultural land productivity and gross income of the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in each township of Beijing city in 1989 and 1999 , four changing patterns in rural areas during this period can be defined. These four patterns are formulated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natural conditions , social economic conditions ,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olicies. Fifth , The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mong rural regions are diversified in Beijing city. The reason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is doubtless that , because of varying natural conditions ,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policies have been applied to each agricultural region , leading to differences in crop production. That is to say , the roles of stat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 policies are very important.

It can understand from the case villages that ,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 the relation between rural reform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Beijing city is different to the way it appears in existing studies. It appears that it has a regional specialty. Its main feature is that , in general , the region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not damaged by the changes of the state policies , but , on the contrary , is somehow improved. A politic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 should highlight not only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 economic relationships on resource use patterns , but also the significance of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nd how their interaction with political economic forces influences human -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s.

Key words : agricultural and rural reform ; political ecology ; state policies ; resource use patterns ; Beijing city